

今日中國的倫理和道德

David W. Lutz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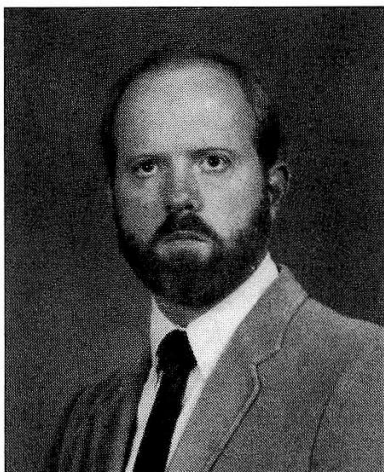
蘇貝蒂譯

(編者按：本文為天主教美中服務處一九九七年十月第十六屆全國天主教中國會議上 Dr. Lutz 所發表的一篇演詞的撮要。本刊承蒙天主教美中服務處及作者允許轉載，特此致謝。)

前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聲稱，提高倫理和道德水平是他們一個重要的目標。在一九九七年九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國家主席江澤民在他的報告中多次提到倫理方面發展的必要。

江澤民強調，中國必須堅持黨領導及人民民主專政，必須搞好物質生活以及文化和倫理生活，使物質與精神並重。中國必須一代接一代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發展面向現代化的社會主義。中



國會循序漸進及廣泛地推動共產主義及倫理道德，亦會鼓勵有助國家及民族大團結，經濟發展及社會進步的一切思想及倫理道德觀。（註一）

在中國，一般人認為教師要在學生面前樹立良好的道德典範，而出色的倫理教師更會獲得嘉獎。再者，中國的三百零二萬專上學生在他們二至五年不等的專上教育期間，有四至七課節是修讀馬克斯主義和倫理，而且是必修科。（註二）中國亦有打擊貪污的計劃。

中國憑著龐大的人口以及經濟上的高增長，在下一個世紀將會成為在經濟及軍事上舉足輕重的超級大國。因此，中國人的道德生活很可能影響其他國家的人民。

東西方的德性倫理

要了解中國目前的倫理狀況，我們必須先認識中國的道德傳統。在這個會議中，我們應當把中國倫理的歷史與基督徒倫理的歷史作出比較。簡單來

說，基督徒的道德傳統包括聖奧斯定和聖多瑪斯的觀點，前者綜合了聖經和柏拉圖的傳統，而後者則綜合了奧斯定和亞里斯多德的傳統。這並非否定在十三世紀以後多位文豪及聖人對教會道德傳統的影響。事實上，在聖多瑪斯以後，曾增添了不少珍貴的論點，包括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近年發表的《真理的光輝》。但縱然陸續有新的思想豐富了教會的傳統，這絕不能否定非基督信仰的希臘及羅馬人的哲學已成為教會傳統的一部份。

在眾多例子中，其中的表表者是對聖經中的信、望、愛的理解，並認為最大的是「愛」。（註三）亦即是希臘傳統所指的仁愛。柏拉圖談論過這四個最重要的德性；亞里斯多德曾辨別倫理和理智的德性；基督徒則把信、望、愛三德歸納為第三類——神學方面的德性。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思想能夠融匯，是由於我們相信在天主特別的啓示以外，人類亦能夠認識到道德方面的某些真理，兩者之間不但沒有衝突，而且能夠互相補充。

雖然希臘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和他們的弟子的德性倫理和中國的孔子（公元前五五一至四七九年）的倫理觀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發展，更以不同語言表達，但他們之間有明顯的共通點。雖然傳統之間及每個傳統本身都存在明顯的分別，但兩者都是以一個理想的人應有的特徵或德性來了解倫理。沒有一個人能完全擁有這些德性，而倫理生活就是不斷邁向這些德性。這種對倫理的理解與歐洲「啓蒙」時代的思想有很強烈的差異。無論你支持康德的「無上命令」或米爾的「功利主義」，現代西方理論是指向行為規範；有些行為可接受，有些則該避免。反之，東西方理解德性倫理為一個人在性格上的優點和缺點。換句話說，雖然現代西方倫理以「做甚麼」為主，德性方面的傳統卻以「是甚麼」為主。

西方思想和儒家思想對德性有另一個共同的觀念，就是兩者都相信人類本性上是社會性及政治性的存有。現代西方倫理認為人類經常面對個人利益和倫理道德的衝突。倫理方面要提出理據說服人類

要利他，而非自我中心。當我們相信人類的道德與本性相似，而本性上人與人之間是有關聯，個人利益與大眾利益則不應有衝突。

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在儒家思想中佔重要的位置。在這一點之上，儒家思想與西方傳統思想在德性方面相似，兩者都是屬於倫理及政治性的傳統。這與現代西方對倫理和政治的理解不同，現代西方思想中，倫理和政治彼此沒有關係。

耶穌會士 James T. Bretzke 是察覺到西方思想和儒家思想在德性倫理方面有共通點的現代作家。Bretzke 指出「仁」是儒家思想中一個最大的德性。要翻譯一個道德上的概念已經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中國古文與現代英文的差異使翻譯更困難。要翻譯「仁」字，英文通常用 *humaneness*（合乎人性、人道），*benevolence*（慈善、仁心）與 *goodness*（良善）。Bretzke 寫道：

要明白「仁」的意思，最有效的方法是看「仁」

在不同人際關係中如何表現出來。「仁」是對人類的普世博愛，但這份愛並非一視同仁。儒家思想絕對是長幼有序，五倫的父子關係中尤其明顯。「仁」不是規限在家庭關係中，而且更伸展到每個人對社會及國家的責任及服務上。

(註四)

孔子並沒有系統化地寫下他的道德思想，我們現在所讀到的《論語》，是孔子回答他的弟子的提問所留下的記載。以下是《論語》中有關完美德性的兩個答案，第一個是關乎行為上的規範，第二個是關乎性格。從這些答問中我們可以瞥見孔子對德性的見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註五)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

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註六)

孔子明白要達至「仁」，需要長時期不斷的進步，從下列兩點可略見一斑。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吾未見其止也！」(註七)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註八)

如亞里斯多德一樣，孔子教導他的弟子，要達至「仁」必須效法仁者。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註九)

另一方面，孔子亦如亞里斯多德一樣明白到，仁者並非只顧利他而放棄自我，而是利己利人並重。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註十)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註十一）

孔子以外，孟子（公元前三七一至二八九年）是另一位儒家思想的宗師。Lee H. Yearly 寫了一本比較孟子和聖多瑪斯論德性的書，他主要寫「勇」方面，但亦提到中國人的德性——「仁」。

孟子和多瑪斯提及的德性明顯的相同點不多。即使是相同，我們仔細研究下亦可發現差異。例如孟子談及的「仁」似乎與多瑪斯的「慈善」相似，但「仁」是孟子一個重要的思想，而「慈善」在多瑪斯的思想中較為次要。另一方面，多瑪斯所指的「博愛」與孟子所指的「仁」相似，但「博愛」與「仁」其實亦有很大分別。（註十二）

在未深入探討儒家思想的「仁」之前，我們已經看到若要完全擁有這些德性就要富於人性，因為德性本身就是人性，要富於人性就是仁慈地與別人相處及交往。

法家與馬列主義

孟子生於法家思想的年代，這思想與儒家思想對立。法家的表表者是韓非子（公元前二八零至二三三年）。

法家相信法治，而不是以道德規範來管治。Arthur Waley 這樣說：「他們相信法律應該取替道德。．．．他們依賴法律，依賴賞罰，由此引申到很多其他要求，通通列在政府管治的規例內；政府必須以『實事求是』為依歸。」（註十三）Waley 說法家和儒家絕對不同，兩者之間毫無共通點，因此仁治和法治有很大的鴻溝。（註十四）

Liu Mu 以中國不同的朝代引証這點，他在一篇為《China Strategic Review》所寫的文章中指出：在封建時代，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同時影響著國家的原則，儒家推崇西周（公元前一千至七百七十一年）的治國模式，而法家則提倡恢復秦朝（公元前二二一至二零七年）的體制。西周

模式的主要原則是「敬拜上天，保護人民」，它有一系列的守則，尤其關注倫理、美學、法律和行政各方面。至於秦朝則只是依賴權力與懲罰。（註十五）

雖然相隔很多個世紀，Liu Mu 認為中國的法家思想和中國的列寧主義是有關係的：

中國共產黨改革了秦朝的獨裁統治，他們把列寧式的獨裁統治引進到中國的國家體制——黨領袖在黨之上，黨在國家之上，國家在人民之上。在這個政制下，每一個人都要服從他的上司，他的上司又要服從更高的當權者，如此類推，最終是服從一位黨領袖。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把獨裁君主提升到一個比以往的帝王更高的地位，關鍵是引進了列寧式的獨裁統治。中國共產黨認為這是馬克斯政治架構的延續，而在這個架構之上，是一位一些中國學所稱謂的「黨皇帝」。（註十六）

儒家思想和西方的德性傳統觀念存在明顯的共通

點；同樣，中國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的傳統亦有相同之處。在西歐和以英語為主的國家，民主自由的傳統已很大程度取代了基督教的道德傳統。Viona P. Rindova 和 William H. Starbuck 這樣寫：

韓非的社會模式與亞當·史密有許多相似之處——人是不道德、自私、工於心計和投機的；競爭帶來好表現；利益衝突令彼此盡力做得最好；一切成就是由於一個有效率的結構，而非由於個人。韓非對於組織的憧憬在某方面與麥克斯·韋伯的官僚架構相似——客觀的規例和程序帶來貫徹性，亦可抵消個人的自私和慾望帶來的弊端。（註十七）

我們發現英美式的個人物質主義和中國的集體物質主義同樣導致實用主義。

毛澤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鄧小平則策劃國家經濟改革。一位欣賞鄧小平的美國人這樣說：「在哲學和方法學方面，鄧把馬克思的辯證法及唯物論與實用主義的方法學結合在一起。」（註十八）

一言概之，鄧在意識形態上是一位實用主義者。他所力主的「實事求是」政策，與二十一個世紀之前的法家和美國二十世紀的哲學明顯相似。我們相信「事實」和「價值」是二分的；我們從經驗觀察和數學推論來知曉「事實」，其他的一切，包括信仰和道德，都在「事實」的範疇以外。在倫理方面，你認為真實的，為我來說未必是。

實用主義無論為中國人或美國人都不可能永遠保存，因為它會導致道德上的無政府狀態。鄧的口號是「致富就是光榮」。這一措舉會在中國社會中帶來嚴重的道德問題。正如一位中國商人說：「我們不再談論政治了，講又有什麼用呢？誰是我們的領袖？金錢就是們的領袖。」（註十九）假如多數中國人不再談論政治，他們也不會談論倫理。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始創人；鄧小平是經濟改革的建築師；今天江澤民是「（社會）精神文明」的傳道者。「精神文明」這句話在八零年代初已經流傳，但在一九九六年當整個國家越來越趨

向拜金主義，江澤民仍未能在「精神文明」方面加一把勁。在一項紀念鄧小平的聚會上，江澤民致詞說物質生活的進步和倫理及文化方面的進步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同樣是必須的。（註二十）中國現正處於十字路口——倫理及文化進步應何去何從呢？當然不是走英美式的個人主義和相對道德主義的方向，但也不是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方向。很明顯，在毫無選擇下，江澤民正面談到儒家思想的價值觀，而這些觀念曾經是被共產黨咒詛的。（註二十一）他亦擁護相對論，他說「我相信愛因斯坦在自然科學方面的相對論也可用於政治方面。民主和民權是相對的概念，而並非絕對及一般性的。」（註二十二）

（註釋見本刊今期英文版頁15。）